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46期（民國93年12月）·237-24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一輝有無「革命情結」？

黃自進，《北一輝的革命情結：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350頁。

陳景彥*

一

黃自進先生畢業於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取得法學碩士、博士學位，曾任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1906-1932》專著一本、《滿州事變の衝擊》等合著三本，並撰寫有關辛亥革命、「九一八」事變時期之中日關係研究論文多篇，可稱為研究日本及中日關係的重要學者。

二

《北一輝的革命情結：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以下簡稱「本書」）一書除自序外，由前言、正文三章和結論共三大部份構成，其後附有徵引書

*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

目與索引。在前言中，作者對北一輝的生平及思想、著作進行了概括性介紹，並在前言之結尾處表明寫作本書的手法與目的：「本書採取重回歷史現場的實事求是作法，冀望透過衆多第一手史料的徵引和研究，除還北一輝本來面目之外，也期待藉由對北一輝的探討，為近代中日關係史提供另外一個角度的省思。」（頁 10）誠可謂開宗明義，目的明確，觀點清晰。

通讀本書，可知作者史料功底之深，外語水平之高，在年輕學者中也是佼佼者。首先，以徵引書目觀之，中文參考資料中有史料、報紙 3 種，專著 22 部，論文 15 篇；日文參考資料中有檔案、史料、報紙、辭典 18 種，專著 90 部，論文 47 篇；還有英文參考資料 17 種（詳見本書，頁 325-341）。中文參考資料可姑置勿論，大量的日文與英文資料的閱讀理解及翻譯研究，如果沒有深厚的外語功底和造詣是根本無法做到的。即使有此基礎，若不花費大量時間（作者自序中為 6 年），付出艱苦的努力，也不可能完成本書。其次，從本書註釋及引文而言，10 頁的前言，便有 24 處；而三章正文共計 297 頁，註釋及引文則有 720 處，無論前言還是正文，平均每頁都達 2.4 處。本書的研究內容基本可以劃在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範疇（當然亦可歸類為歷史人物研究），而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無疑是歷史研究的要項。歷史研究中的一條準則就是以史料來證明歷史、解讀歷史，以之為鑒，汲取經驗教訓。從本書註釋及引文評之，可以說其基本做到了事事有交代，條條有出處，言之有據，論事自成一家之說。由本書框架結構而論，正文的三章，第一章含三節，第二、三章各由兩節組成，章節之間既可獨立敘事，又能有機聯繫。三章之中，第一章以北一輝的生活時代背景為經，分別以北一輝的三部著作《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支那革命外史》和《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為緯，並對北一輝的三部著作進行初步介紹；第二、三章則以北一輝在中日兩國的活動及其時代背景為經，再以對《支那革命外史》和《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深入分析為緯，經緯分明地將北一輝在中日兩國的活動進行條分縷析，鋪陳述論，井井有條；結論部份則以簡潔的語言，對北一輝思想與活動進行歸納

總結。本書可謂結構合理，詳略基本得當。概而言之，本書無論從史料徵引、註釋引文上，還是從章節結構來看，都具有其史料與學術價值。

三

從本書的主題而言：第一章〈奔走於中日兩國革命的時代背景〉，並非本書的核心內容，但它卻是把握北一輝的思想發展、心路歷程和在中日兩國的實踐活動等脈絡所不可或缺的背景描述。作者敘述分析了在明治政府的權力結構下，北一輝所產生的「反法統、反皇權的思想動力」，稱北一輝的天皇論「有其學理上的見解，也有其實務的考證」（頁 35）。並讚賞北一輝「不惜以身試法，以批評天皇論為前提，為他人所不敢為，而且用詞尖酸潑辣，將國是、國策嬉笑怒罵玩弄於股掌之中」的行為，認為「這種膽識，驚世駭俗」（頁 40）。在第一章裡，作者在其所設三節中，分別論及了北一輝的三部主要著作，認為《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不僅是他個人學術成就的里程碑，同時也是解剖他奔走中日兩國革命、集悲歡離合於一生史實的最佳注腳」（頁 11）；認為《支那革命外史》「可說是一本綜合事實陳述以及理論建構的專著。雖然陳述事實和建構理論，分屬兩個不同的層面，但是北一輝卻能兼顧，展現出其多元性的才華」（頁 41），認可北一輝寫書的目的「本意是為了替自己所心儀的中國革命黨友人爭取奧援」（頁 41）之日本學者的觀點；認為《日本改造法案大綱》「被戰前的日本少壯軍人視為推動日本革命時奉守不渝的聖典，使他對日本的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推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頁 68）。本章還論述了北一輝對英日關係和「天皇親政論」等觀點，也都是讚譽有加的。

本書第二章〈投身中國革命的經驗〉可視為本書的核心內容之一。該章所設兩節都與辛亥革命或者說與中國革命緊緊相關。在第一節中，作者從北一輝「投身中國革命的契機」和「對辛亥革命的認知」兩個層面展開論述。

在第一層面中，首先指出北一輝之所以「投身中國革命，無非是時勢使然」，並歸納出具體三點原因（詳見頁 107）；接著述及北一輝在《革命評論》社的活動，以及其與孫中山的關係；最後斷言「同盟會的內鬨事件可視為北一輝投身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這之前，他以客卿身分義助中國革命，但此事之後，他已全神溶入中國革命，開始將中國革命視為是自己的生活事業。」（頁 123）在第二層面裡，作者從北一輝任《時事月函》特派記者到中國，為了向黑龍會彙報時局留下的 13 封書函和 36 封電報入手，分析了北一輝「對辛亥革命的觀測」，將北一輝的「辛亥革命史觀」分為早、後兩個時期，每期各歸納為四點。前者為北一輝對留日學生、革命黨人的思想及行動模式、宋教仁、孫中山的評價；後者則是「在爭取日本對革命黨人的支持以及探討革命後中日關係應如何走向為主要課題」的四點主張（頁 135-145）。在第二節中，作者主要圍繞《支那革命外史》進行著墨，在充分分析北一輝的「撰寫動機」後，進而對該書兩個「不同主題」加以解析。該節中的關鍵與核心為第三小節「中國革命認知上的發展與轉變」。此不僅為該節也是本章著墨最多、內容最為豐富者，尤其是對北一輝論述中國革命「與一般的中國近代史相較有七點特殊之處」（頁 167-171）的指陳，更是發前人所未發。作者還證實北一輝此書的「基礎史料來自於譚人鳳的《牌詞》」（頁 173-174）。同時也指出北一輝書中「所言似是而非」、「有違史實」（頁 178）之處，可謂持論公允。

本書第三章〈轉入日本革命的心路〉，與第二章具有同樣的核心地位。三章之中本章篇幅最長，敍事最細。畢竟北一輝在中國的時間遠不能與其在本國時間相較，故如此設置亦屬合理。本章第一節寫作手法與第二章之第二節頗有相似之處。先是簡略介紹北一輝撰寫《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的歷程，繼而闡述北一輝「對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的看法」，最後則以北一輝在「右翼運動中的經歷」結束第一節。此節中最為精彩的論述，應是作者將北一輝對五四運動的態度，與幾乎是其同時代的吉野作造進行比較，從而凸顯出北

一輝「不能掌握中國政治發展的時代脈絡，這種與中國現實脫節的事實」（頁 209），當然這也同作者此前對吉野作造有過深入的研究不無關係。作者在敍述北一輝的「右翼運動中的經歷」時，除談及北一輝與「猶存社」的關係外，也未規避其介入政治醜聞事件，全面展示了北一輝的所作所為。在第二節的第一小節裡，作者通過退伍軍人「西田稅與『天劍黨』」、「『櫻花會』的政變計劃」和「『統制派』與『皇道派』的誕生」，對這些右翼團體及右翼軍人的活動，勾勒出北一輝的思想和著作對他們的影響，「重新審視在日本法西斯主義興盛過程中，北一輝在理論的建構以及軍部奪權的實例上所扮演的具體角色。」（頁 253）第二小節以二・二六事變為基軸，論述事變的起因與目的、日本軍部內矛盾以及北一輝與事變之關係。認為「二・二六事變中的北一輝，既非核心集團成員，也無政治野心，所圖的無非只是現實生活的利益」（頁 292）。作者還運用所掌握的法律知識，指陳日本軍事法庭對北一輝「訴諸以思想罪，實難以在法理上成立」（頁 288），認為「他之所以會被處以極刑……係屬政治考量」（頁 292）。最後，對北一輝的赴刑表現，作者也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北一輝拒不從俗，至死表現出他一貫的特立獨行性格」（頁 307）。

四

最後，我想對本書存在的問題談幾點看法。

其一，本書的關鍵字是「革命」，但作者並沒有對革命一詞進行任何闡釋。革命一詞出於《易・革》，言「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可見，革命一詞從產生起，便具有強烈的褒義。時至今日，革命一詞的基本內核，在社會的主流意識中仍是社會政治、經濟之大變革的意思，並具有進步性和褒義。從我們經常所說的社會革命、工業革命、技術革命、農業革命等詞語即可得以證實。本書作者先入為主地把北

一輝在中日兩國的活動定性為「革命的歷程」，缺少將北一輝的行動性質與革命的內涵進行聯繫分析，以論證北一輝的行為確為革命的論述。日文「革命」一詞，字面上雖與中國語完全相同，但在使用上，其所具有的進步性和褒義遠不如中國語明顯，更多的是作為中性詞使用。本書是由中文撰寫，自當以中文語義評之。

其二，對北一輝「投身中國革命」原因的論述。無論是「革命情結」還是「從事革命」，都具有情感色彩、主觀因素。分析北一輝行為的主觀意圖，誠為判斷其是否具有革命情結所不可或缺的關鍵所在。本書作者指出北一輝「投身中國革命」的原因有以下三點：一是解決眼前生活困境；二是迴避日本政府的壓迫；三是實踐兩國革命共同體的社會主義理想（頁 107）。可以說這三點均為北一輝之主觀意圖。然我認為除第一點外，餘兩點皆可商榷。就第二點而言，儘管本書作者在評論北一輝投身《革命評論》社，加入中國同盟會的「多重考慮」時，談到了北一輝的想法，但從本書的敘述和北一輝的言論中，除《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被查禁外，並沒有表現出日本政府對北一輝的更多壓迫，至少這種所謂「壓迫」遠不如他「轉入日本革命」後嚴厲。對第三點原因亦有疑問。1906 年，《民報》周年慶時，日本來賓共有 6 人，「當天的日本來賓，皆以支援中國革命為談話主軸，只有北一輝，不僅沒有明言表態支持中國革命，反而以身為《革命評論》社一員，理應支持《民報》宗旨的發言方式，表明了自己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僅限定於《革命評論》社與《民報》之間因相互提攜締結姊妹誌而萌生的來往情誼。」（頁 115，註 23）這與北一輝「投身中國革命」第三點原因是矛盾的。而第一點原因，卻恰恰說明北一輝當初「投身中國革命」只是為了混一口飯而已，而不是對於某種高尚的革命理念的堅定追求。在北一輝決定以放棄財產繼承權為賭注，而出版他的處女作《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一書之後，「經濟拮据的他，原本希望藉由此書脫離生活上的困窘」（頁 108），但此書很快被日本政府查禁，自此北一輝「生活上的壓力更是即刻浮現」（頁 108）。可

以說此時的北一輝僅僅是為了生存，他才選擇了《革命評論》社。

其三，對北一輝前後變化缺少深入分析。這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北一輝對中國東北的態度，二是北一輝對「天皇親政論」的態度。1912年，當日本趁辛亥革命之機策劃「滿蒙獨立」時，北一輝通過內田良平「要求他力阻日本政府支持滿洲獨立計劃」（頁145），「認為日本不應因圖謀滿洲，而犧牲與革命黨人的情誼」（頁146），即是說北一輝不主張日本佔領東北，但後來他「卻對國民政府的北伐政策表示冷漠，而表態支持以維護日本既得權益為口號的『九·一八』事變」（頁217）。作者沒有對北一輝這一重要轉變展開詳細分析。他不主張日本佔領東北時，是「鑑於革命黨也是日本培養出來的親日勢力，日本不應因眼前『滿洲』的小利益而放棄未來掌控整個『中國』的大利益」（頁146）。這將便於他所設想的以日本為主導的「中日命運共同體」。但當由日本培養出來的昔日的親日勢力失勢時，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新興國際理論的衝擊下逐漸覺醒，並發動了「五四」愛國運動，反帝鋒芒直指日本後，使北一輝的「為了驅逐西洋列強在中國的殖民勢力，革命後的中國，也有仰賴日本奧援的必要」（頁47）的預想破產，於是便轉到「以維護日本既得權益」上來。作者對北一輝早年著作中「公然批評『天皇親政論』」，認為「他是為了要揭穿明治政府假天皇治國之名而行專制之實」；中年他「高舉『天皇親政論』」，是為了要正本清源，也即為了要政府將其擅用的權力還諸天皇」（頁321）。按作者的邏輯，北一輝批評「天皇親政論」是「革命」行為，他高舉「天皇親政論」還是「革命」行為，兩者都是北一輝「造反有理」的理論。這種闡述不僅在邏輯上難以服人，而且缺少對北一輝這180度的大轉變原因的系統分析。

其四，北一輝反對現政府，主張進行「國家改造」，是否就是革命？北一輝從青年時開始，便有反對現政府的思想與行動。從他在《佐渡新聞》上發表有關日本國體的文章，和撰寫《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的史實中均可佐證。但若以其不幸經歷觀之，他反對現政府實與革命相去甚遠。中學時，

北一輝曾愛戀上一個酒商的女兒，但因家庭反對而未果，又因其父生意破產，導致其中途輟學，加之眼疾等種種痛苦，使其對社會充滿不平與仇恨。青年時期的遭遇對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的形成至關重要。他的不幸經歷造就了其賭博、冒險和報復社會的性格。他爲了《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的出版，「不惜以放棄財產繼承權爲許諾」，是出於欲一鳴驚人的冒險；參加「同盟會」同樣具有賭博、冒險的性質，因爲他對當時的中國革命及其領導者孫中山並不瞭解。再看他「國家改造」的實踐：他回國後立即「上書皇太子七卷中國版的法華經」，「表露出北一輝個人企圖接近皇室的主觀願望」（頁 223），由此他可以通過與皇室的接近，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北一輝妄圖運用這種政治鬥爭權術，並充分利用「面臨轉型期的日本政府的複雜性」，追求在「日本政壇的崛起」（頁 225）。這種以攀附日本皇室以圖自身在政壇崛起的政治權術，不僅具有一定的冒險性，且具有向現政府挑戰的意義，同時也可作爲他對「天皇親政論」態度變化的註腳。而此後他所介入的政治醜聞事件，更是彰顯了他報復社會的性格。北一輝介入「安田共濟保險事件」的初次經歷，「恐嚇竟然成爲他的新的謀生工具」（頁 238）。在第一次以恐嚇詐財得逞後，北一輝又相繼介入了「十五銀行的不良貸款事件」、「皇室耕地的不當放領事件」及「朴烈・文子的監獄春宮照片事件」，並且「在這一連串政治醜聞事件中，北一輝在詐財方面連連得逞。使他在短短兩年之間，從貧無立錐之地頓成巨富」（頁 240）。北一輝還利用右翼勢力的崛起所造成日本政局的複雜性，在這種「脫序時代裡」，「行走法律的邊緣」，而使自己「自然成爲日本財閥刻意籠絡的對象」（頁 251）。甚至在二・二六事變的傍晚，他還對來訪的友人寺田稻次郎表示：「咱們兩個今後也可以好好玩要一番了。」（頁 292）他的這些實際行動若非報復社會，則不能得其解，根本不是革命理念，更不是「革命經歷」和「革命情結」。至於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不論其有多少合理成份，或如何「被戰前的日本少壯軍人視爲推動日本革命時奉守不渝的聖典」，其主旨也是試圖在

日本建立以天皇爲首「一君萬民」的法西斯專制制度。以這種專制制度來取代當時現存的日本專制制度，無論如何也難稱革命，從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來看，更談不上是進步。總之，我認爲北一輝與「革命情結」相去甚遠，他所從事的並非「革命」。

本書基本無錯字，這也體現了作者治學嚴謹與認真態度。只是涉及二·二六事變之人物在 273、275、276 頁中，有多處爲「村中孝次」，但在 297-299 頁中，卻多次出現「中村孝次」，從前後文關係來看，兩者似爲一人。如是，則其中當有一誤。另外，本書後附索引中，標明「村中孝次」第一次出現於 248 頁，然 248 頁並無此人名，「中村孝次」則未在索引中列出。